
新疆塔里木盆地小河文化溯源及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

李文瑛

摘 要: 小河文化是青铜时代出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地区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通过小河文化分期,结合小河人类遗骸古 DNA 研究新成果、塔里木盆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等综合分析,小河人群和文化的主体始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遗传谱系上是古北亚(ANE)和古东亚(AEA)成分的混合类型。小河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北方草原地区、河西走廊和中国西北的其他地区,进行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小河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考古学个案,阐释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亚洲大陆上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展示了自史前时期开始,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斑斓多彩。

关键词: 小河文化 溯源 古 DNA 石器时代 交流与互动

考古发现显示,小河文化分布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兴起于公元前 3 千纪下半叶,繁盛于公元前 2 千纪上半叶,公元前 2 千纪下半叶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小河文化遗存目前已发现 20 余处,以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大三角洲一带分布最为集中。小河文化的来源及其所反映的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是小河文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本文结合小河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相关多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小河文化溯源

关于小河文化的来源,目前的研究者多从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遗传学的视角,

^{*} 本文关于小河文化遗存古 DNA 研究成果的认识,得到崔银秋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将小河文化的形成与欧亚草原人群的南下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它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及其后的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及高加索地区青铜时代的人群,由北向南迁入塔里木盆地有关。相关讨论为小河文化探源研究积累了材料。^① 小河文化溯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基于现有考古资料对小河文化进行分期和年代研究,再结合小河人类遗骸古DNA研究的新成果、塔里木盆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中国西北地区家养牛羊和小麦、黍的发现与研究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 小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小河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是小河文化探源研究的基础问题。目前,小河文化遗存除了正式发掘的小河墓地、^②孔雀河古墓沟墓地、^③铁板河墓地、^④抢救性清理的于田县克里雅北方墓地^⑤外,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陈宗器等在孔雀河流域、罗布泊一带发现的LS、LT、LF、LQ,^⑥孔雀河三角洲36号墓、37号墓^⑦,以及黄文弼在孔雀河岸发现的早期墓葬,^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罗布泊北调查发现的一些早期墓地、遗址,^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若羌县文物管理部门发现的一些早期墓地,^⑩近年罗

① 参见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新疆文物》2002年3、4期;王炳华《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相关研究的梳理,可参见贾伟明、丛德新《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人群——从小河文化与人群构成说起》,考古杂志社编《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②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1期;新疆文物考古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10期。

③ 参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墓葬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1期;王炳华编著《古墓沟》,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 参见穆舜英《楼兰古尸的发现及其研究》,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⑤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新疆古墓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⑥ 参见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COSMO Publication, 1988, pp.263-737.

⑦ 参见Foi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Trycken Aktiebolaget Thule, 1939, pp.136-139, p136-139。

⑧ 参见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98-101页;李文瑛《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他》,《新疆文物》2014年第2期。

⑨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第92页。

⑩ 参见牛耕《近年来罗布淖尔地区的考古发现》,《西域研究》2004年2期。

布泊地区综合考察发现的 10 处早期遗址等,^①经分析辨识,都可归入小河文化范畴。

1. 小河文化的分期

小河墓地是小河文化中规模最大、发掘最全面、信息最丰富的一处遗存。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墓葬 139 座,分五层上下布列,北区仅残存下层部分墓葬,可与南区相应层位对应。根据小河墓地不同层位间墓葬布局结构、丧葬习俗、遗物特征的变化,参考相关墓地的文化特征分析,小河文化前后兴衰演变的脉络比较明显,大体可以分为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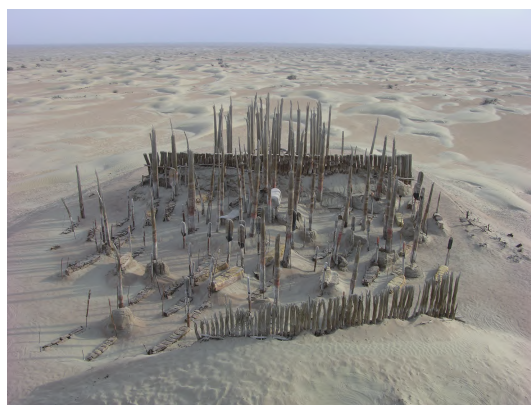


图 1 小河墓地南区第五层与部分第四层墓葬全景

第一期。这一期代表性遗存是小河墓地南区底部的两层墓葬,即第四、第五层(见图 1),以及北区现存 28 座墓葬与部分被破坏的墓葬。南区的两层,每层都以一座围有高大木柱圈的泥壳木棺墓(墓主为女性)为核心,有序布列墓葬(见图 2 第 1 图)。除这种明显具有祭祀功能的泥壳木棺墓外,其他普通墓葬棺前普遍都竖有象征男根或女阴的立木,在这类立木前,地表上再立一根高 3~5 米的涂红木柱。木棺均为胡杨木拼合而成的无底棺,第一期主要为直侧板、弧形侧板(见图 2 第 3、4 图)。北区主要做祭祀区使用,同时也有一些普通墓葬。北区的祭祀建筑有两种,一种是“木房式墓葬”,墓主人可能是女性(见图 2 第 2 图);另一种与南区的同类建筑相同,都是围有高大木柱圈的泥壳木棺墓,但墓主人早晚有变化,开始是女性,后来是男性,而且男性墓祭祀建筑的规模变大。北区的墓葬,棺具、葬俗等都与南区的基本相同。

古墓沟第一类型的墓葬及铁板河墓葬,从所测碳十四数据分析,当属于小河文化第一期(见图 2 第 5 图)。斯坦因发现的 LF 墓地“三普”做过复查、“三普”中调查的 09LE50 号墓地碳十四测年,数据也都较早,集中在公元前 2 200—前 1 880 年。^②

① 参见 Kangkang Li, Xiaoguang Qin, Bing Xu et al., “New Radiocarbon Dating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eal the Westward Migration of Prehistoric Humans in the Drylands of the Asian Interior,” *The Holocene*, 31(10), pp.1555–1570.

② 数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提供。



图 2 小河文化的墓葬

1.小河墓地泥壳木棺墓(M75);2.小河墓地木房式墓葬(BM28);3、4.小河墓地第四层弧形侧板、直侧板木棺(去盖板后);5.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6.克里雅北方墓地被扰木棺;7.LF墓地棺上存木板围栏;8.小河墓地第三层弧形侧板木棺;9.罗布泊古尸与青铜短剑;10.孔雀河三角洲36号墓古尸;11.黄文弼发掘独木舟式棺;12.古墓沟墓葬地表“太阳”形标志;13.咸水泉10号墓地木楔围圈局部;(1-7为小河文化第一期遗存;8、12、13为小河文化第二期遗存;9-11为小河文化第三期遗存)

另外,从墓葬形制及遗物看,LF、LT 墓地都存在一种木棺上部竖立木板围栏的墓葬形制(见图2第7图),它与小河墓地属于小河文化一期的泥壳木棺墓的局部结构相同,而且在这些墓葬中都发现有泥壳木棺墓常见的人形雕像,还有尖底草编器、长石棒等。所以这些墓葬时代上,亦可能属小河文化第一期。地方文管所近年在楼兰 LE 城东北的发现,^①从草簍纹样及服饰上看,与古墓沟第一类型墓葬及铁板河墓葬遗物相似之处较多,故也可归为小河文化第一期。

塔里木盆地克里雅北方墓地和小河墓地相似,外观也为椭圆形沙丘,南北 48.5 米、东西 34 米、高约 4 米,墓地中部偏南也有一排分隔墓区的木栅墙,墓葬上下分层埋葬。从散落的棺板及露出的底层墓葬的棺前男根、女阴立木统计看,墓地约有墓葬近百座。在墓地周围还发现刻画纹陶片、铜刀、玉斧、石磨盘、石箭簇、细石叶等。从地表清理的遗迹、遗物看,其文化特征与小河墓地四、五层遗存接近。克里雅北方墓地用地表采集的纺织品、植物样本做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 1 880—前 1 700 年,^②和小河墓地早期年代基本一致,可归属于小河文化第一期。克里雅墓葬上下分层埋葬,说明墓地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可惜遗存已被盗掘破坏殆尽),现地表遗存,属于墓地最晚阶段的遗存(见图2第6图)。由此推测克里雅河流域尾闾区,存在着比小河墓地早期文化更早的遗存。多年来,在克里雅河尾闾区域采集的青铜时代遗物,有的可能属于这一时期。^③这些都为探寻小河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二期。这一期的遗存以小河墓地南区一、二、三层墓葬为代表,还包括南、北两区大部分被扰乱破坏的墓葬。从第三层开始,南区墓葬木棺形制上有所变化,均为弧形侧板,已不见直侧板(见图2第8图)。棺前栽竖高大涂红木柱的墓葬锐减,至第一层墓葬棺前已不见栽立这类木柱,而且从第一层开始,棺前竖男根或女阴立木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见。北区上层遗存已被破坏殆尽,采集到大量棺木及数以千计的短木楔。对这类短木楔的功用,可与古墓沟墓葬比较做进一步分析。从叠压关系看,古墓沟墓地第二类型的墓葬晚于第一类型,前者地表用数百根短木楔围成极为壮观的放射状“太阳”形标志,发掘者认为这同太阳崇拜有关(见图2第12图)。^④棺内均葬男性,仅 6 座,这和普通的墓葬显然不一样,其祭祀功能要大于作为墓葬的埋藏功能,所谓的“太阳墓”实际上是一种祭祀遗存。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存,在小河南区的第五层和第四层、北区相当于第四层的遗迹中就已经存在,而且北区还是主要的祭祀区,祭

① 若羌县博物馆展出多具采集自罗布泊地区的小河文化遗存的古尸及文物。

② 数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提供。

③ 参见林铃梅、李肖、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近年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采集陶器的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6—57 页。

④ 参见王炳华《古墓沟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 2 期。

祀建筑中的墓主人由女性向男性的转变也发生在北区偏晚阶段。结合北区地表采集的大量短木楔分析,在相当于南区第一、二、三层墓葬阶段,北区分布的仍主要是一些祭祀建筑,但建筑形制发生了变化,推测其大致与古墓沟“太阳墓”类似。若以一座“太阳墓”用木约 900 根计,^①小河墓地北区至少分布 3 座这样的太阳形祭祀遗存。除古墓沟“太阳墓”外,“三普”期间发现的 09 咸水泉 10 号墓地,也发现有木楔构成的围圈,与“太阳墓”围圈相似(见图 2 第 13 图),所以暂时也将其归于小河文化的第二期。

第三期。这一期的遗存有斯文赫定发现的孔雀河三角洲 36 号墓和黄文弼发掘的墓葬,这些墓葬棺具都是用半圆木掏成的独木舟式棺(见图 2 第 10、11 图)。另外,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的调查,曾在罗布泊附近发现一具干尸,其头戴尖圆顶的毡帽,帽插翎羽,身裹斗篷,显然属于小河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死者头侧放有一把青铜短剑。^②(见图 2 第 9 图)从这把青铜短剑的特征分析,其时代晚到青铜时代晚期。

2. 小河文化的年代

目前小河文化遗存先后测有近 80 个碳十四测年数据。^③综合分析这些数据,大致可推定,小河文化第一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2 000 年前后到公元前 1 700 年间;第二期约在公元前 1 700 年到公元前 1 450 年,此段下限还要晚些;小河文化第三期遗存,目前尚未测碳十四年代,依据罗布泊墓葬那把青铜短剑的特征推测、可能晚到公元前 2 千纪末。

小河文化的分期与文化的探源关系密切,从分期看,小河文化早期遗存,以生殖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信仰体系,草编、毛织技术与配套服饰制作、骨雕、木雕、皮革加工等手工业体系,都表现出相当进步的技术形态,稳定且持久,看不出文化初始阶段状态的太多迹象。由此推测,小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传统,最初形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

(二) 小河人类遗骸古 DNA 研究的重要启示

以往无论是测量体质人类学还是古 DNA 的研究,均倾向于认为小河文化人群源

① 参见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卷》,图版。

③ 其中小河墓地累计测有 51 个 AMS(加速器质谱分析)碳十四数据、克里雅北方墓地 5 个,斯坦因发现的 LF 墓地(2006 年编为 6LE II 高台墓地) 2 个,“三普”中复查的 09LE50 号墓地(2006 年编为 06LE III 高台墓地)也测有 2 个。古墓沟墓地先后测有 7 个碳十四数据,铁板河墓地测有 1 个。罗布泊地区综合考察 10 处早期遗址,测有 22 个数据。数据主要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并提供。

于内陆欧亚北部草原及东欧地区。^① 2021 年,吉林大学崔银秋教授研究团队,在《自然》(*Nature*) 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新疆古代人群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了对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的小河墓地早期墓葬(第四、五层,小河文化第一期)、古墓沟墓地、克里雅河北方墓地,以及准噶尔盆地西北缘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3 000—前 2 500 年)的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尼勒克县 G218 国道墓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松树沟墓地出土人类遗骸样本的遗传数据分析,发现小河文化三处墓地所测样本,在遗传结构上非常相似,小河文化早期人群代表了更新世晚期一支由古北亚(ANE) 和古东亚(AEA) 成分组成的古老遗传谱系,这一谱系在新石器时代就曾广泛存在于包括南、北疆在内的欧亚草原中、东部的广袤区域。而且,小河早期个体没有显示出与任何其他全新世群体混合的迹象,与以颜那亚人群所代表的欧亚草原人群以及中亚绿洲人群都没有直接的遗传联系。塔里木盆地东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保存了人群遗传结构的原始隔离状态。研究追溯,小河人群的祖先成分形成时间至少在其 183 代以前,约在距今 9 000 年。与塔里木盆地不同的是,相邻的准噶尔盆地西北三个铜石并用时代样本,在遗传成分上清晰地显示出起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人群成分与当地群体不同比例的混合,并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暗示了欧亚草原人群进入新疆的路径。^② 2022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对新疆地区古代人群开展了系统性古基因组研究,从南北疆 39 个遗址中,对 201 例古代人类(年代距今 5 043—515 年) 的基因组进行了成功测序,^③其中关于塔里木盆地青铜时代人群谱系的分析,所持观点与崔银秋教授研究团队一致。

小河古 DNA 研究的新成果,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小河文化第一期及之前小河文化人群的祖先,不存在以颜那亚人群所代表的欧亚草原人群遗传成分。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小河文化早期人群,在遗传谱系上也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无关。那么以往认为的中亚北部和西部人群向东、向南迁徙过程中与当地人群进行基因交流,从而形成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这一人群经阿尔泰山脉南下,继而翻越天山山脉进入塔里木盆地,进而形成小河文化的有关推论,就失去了古遗传学研究成果的支持。就是说,小河人群的祖先至少在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在新疆活动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年代最迟也在公元前 3 000 年前,甚至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

① 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参见贾伟明、丛德新《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人群——从小河文化与人群构成说起》,《考古学集刊》第 27 集。

② 参见 Fan Zhang, Chao Ning, Scott A. et al.,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27 October 2021 (published online), pp. 256–261.

③ 参见 Kumar V, Wenjun Wang, Jie Zhang, et al., “Bronze and Iron Age population movements underlie Xinjiang population history,” *Science*, 1 Apr 2022, pp. 62–69.

(三) 塔里木盆地东部细石器遗存及其制造者

据古 DNA 研究的新成果,小河文化早期人群在遗传上是一个由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组成的人群,其祖先成分形成的时间在距今 9 000 年左右,该遗传特征的人群曾广泛存在于欧亚草原中东部区域。距今 9 000 年开始至距今 5 300 前,即颜那亚人群向东迁入欧亚北部草原之前的这段时期,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如前所述,据目前的调查与发掘,划分出来的小河文化第一期遗存已表现出十分成熟的状态。所以,小河文化做为结构稳定,面貌统一的文化体,一定还存在一个更早的、初始的阶段。小河文化的起源,应该到其分布区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去寻找。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主要是细石器。19 世纪末以来,中外学者先后在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特别是孔雀河三角洲的许多地点不断发现细石器,而且这里也是新疆地区细石器最主要的发现区域。新中国成立后,孔雀河三角洲地区细石器有多次重要发现。1979 年、1980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两次在楼兰遗址考察,采集石器一百多件;^①1988 年楼兰文物普查队,在楼兰城内外及城西南 20 余公里范围内,以及 LK 城南 10 公里和 LK、LL 城内外及周围,采集到石器 400 余件;^②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为配合沙漠石油物探,文物工作者多次在罗布泊地区采集文物数以千计,其中最多的是细石器。^③ 考古调查表明,罗布泊附近是新疆细石器文化密集分布区,这里细石器的发现,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楼兰遗址及其周围是孔雀河下游三角洲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聚点和中心”。^④

据研究,在中国北方存在一个细石器带状分布区,石器风格一致,其年代被认为在距今 10 000 到 7 000 年,^⑤新疆是这一细石器文化带的重要组成区域。以往,新疆的细石器年代,多根据类型学比较分析,一般将其定在距今 7 000 年到 4 000 年,^⑥罗布泊地区发现的细石器,有学者将其年代追溯至 10 000 年前后,^⑦其下限认为不会晚于距今 4 000 年前。^⑧ 近年发掘的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首次发现旧石器至早期铁器

① 参见新疆考古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 年 7 期。

② 参见张玉忠、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简报》,穆舜英、张平主编《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 192-222 页。

③ 参见牛耕《近年来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发现》,《西域研究》2004 年 2 期。

④ 参见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废弃》,《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 2 期。

⑤ 参见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 年 3 期。

⑥ 参见王炳华《略说“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⑦ 参见王炳华《沧桑楼兰——罗布泊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75 页。

⑧ 参见伊弟利斯《新疆地区细石遗存》,《新疆文物》1993 年 3 期。

时代连续地层,在青铜时代文化层下堆积中发现了细石器遗存,包括细石叶、细石核、石片等石制品。这也是新疆地区第一次发现具有明确地层的细石器。此层位木炭样本测年为距今 13 000—8 900 年,为探索新疆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层位学依据。^① 由于新疆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属于这一阶段的墓葬(人类遗骸),无从对这些细石器的制造者进行直接形态观察和古 DNA 研究。但是,如上所述,这一阶段欧亚草原中东部广袤区域,生活着的是古北亚(ANE)和古东亚(AEA)成分组成的人群。结合小河文化分布区内采集的细石器,与中国北方辽阔区域内细石器文化表现出的统一性特征,可以推测塔里木盆地细石器的制造者,遗传特征上就是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的混合人群,他们是小河文化早期人群的祖先。

(四) 家养牛羊和小麦的东传

小河文化从早期到晚期的遗存中,普遍发现有牛羊的遗骸,以及小麦和黍类农作物,这些家养牛羊和种植的农作物,几乎用于小河文化人群的整个丧葬仪式中。结合中国西北地区家养牛羊和小麦的考古发现、小河文化动植物遗存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进展,考察家养牛羊和小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和路径,对小河文化的探源也有重要启示。

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家养的黄牛和羊在中国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甘肃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发现家养黄牛遗存为距今 5 400—4 700 年,^② 山庄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层发现的家养黄牛遗存为公元前 3 300—前 3000 年,^③ 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了距今 5 600—4 000 年的牛骨。^④ 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层也发现家养牛骨的遗存。中原地区,在河南柘城县山台寺遗址的一个属于龙山文化(公元前 2 500—前 2 200 年)的灰坑里,发现了九只牛的完整骨骼。^⑤

在中国,黄牛(Cattle)是指牦牛和水牛以外的所有家牛,分为普通牛(*Bos taurus*)和瘤牛(*Bos indicus*)两个种,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动物。一般认为普通牛最初驯化发生在 11 000 年前,地点在近东地区。近年吉林大学汤卓炜、蔡大伟科研团队,对中国北方地区黄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表明,在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古代黄牛均为

① 参见于建军:《文脉流传数万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收获》,《文物天地》2021 年 7 期。

② 参见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5—339 页。

③ 参见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第 335—339 页。

④ 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其特征》,《考古》2009 年第 5 期。

⑤ 参见蔡大伟等:《古 DNA 分析研究揭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周慧主编《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及相关家养动植物 DNA 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0 页。

普通牛,未见瘤牛。这一团队曾对小河样本做了形态及统计学分析,显示小河牛与欧洲黄牛有更多的表型特征相似性。对包括新疆小河墓地在内的我国北方5个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其他四个遗址分别是山西陶寺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青海长宁遗址和内蒙古大山前遗址)中的42个黄牛样本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其中小河墓地11个黄牛样本,线粒体世系来源上主要由T2(频率21%)和T3(频率79%)构成,存在7个单倍型,呈现极其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且T2、T3世系全部起源于近东地区。黄牛是一种大型食草类家畜,移动能力并不强,结合考古学文化推断,近东地区的黄牛可能随着早期人群由西向东迁徙最先到达新疆地区,然后向西北、向中原传播。青海西宁市长宁齐家文化遗址的黄牛,均为T3世系,其中的单倍型H9仅被一个长宁黄牛和一个小河黄牛共享,揭示了塔里木盆地与甘青地区黄牛的基因交流。^①

甘肃省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墓葬,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都发现有随葬羊下颌骨或骨架的现象,^②在师赵村遗址齐家文化层、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齐家文化墓葬和甘肃民乐东灰山四坝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了绵羊骨骼。^③青海大通县长宁遗址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700年)聚落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山羊、绵羊和牛等家养动物遗存。中原地区,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500—前1900年)中,出土有家养绵羊,且随着时间推移,绵羊骨骼的数量有所增长。^④汤卓炜团队对小河墓地羊骨样本形态及统计学分析显示,羊有绵羊、山羊,比例相当。与黄牛的最初驯化向外传播的途径一样,牛羊相随,也是随着人群的流动迁徙将其带到了塔里木盆地。

近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碳化麦粒和黍粒。^⑤我国发现小麦比较早的遗址,还有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初到3千纪中叶。^⑥陕西武功赵家来遗址一间房址的泥皮中鉴定出小麦秆印痕,年代约为

① 参见蔡大伟等:《古DNA分析研究揭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周慧主编《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及相关家养动植物DNA研究》,第180页。

② 参见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第335-339页。

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④ 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其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⑤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年7期。

⑥ 参见李璠等《甘肃省民乐东县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1期;李水城、王辉《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考古学研究(十)》第400-405页。

公元前 2 400—2 000 年。^① 甘肃西城驿遗址的第二期出土碳化的大麦和小麦,距今 4 000—3 700 年。^② 小麦在龙山时代已传播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商时期成为当地中原地区农作物的重要品种之一。^③ 六倍体小麦最早起源于近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初期驯化培育,进而成为人类最早的农作物之一。2011 年吉林大学周慧、许月教授科研团队,2019 年崔银秋教授团队,先后对小河墓地及古墓沟墓地出土的小麦进行古 DNA 研究以及来源分析,崔银秋团队还对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小河墓葬丧葬过程中,使用的小麦为六倍体普通小麦。^④ 包括整个西北地区,小麦的发现与扩散表现出与家养牛羊基本相同的情况。

中国北方特别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牛羊和小麦遗存发现的意义在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甘青地区是一个接纳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家养动物的区域,^⑤也是一个接纳来自不同方向的多种农作物的区域。特别是西来的家养牛羊、小麦农作物,至少在公元前 3 000—前 2 500 年,就已经陆续出现在河西走廊和黄河上游。家养牛羊的养畜和小麦种植技术,无疑是公元前 3 000 年左右,经新疆天山地区传播至河西走廊和黄河上游,继而传播到中国北方更广大的区域和中原地区。通天洞遗址距今 5 000 年小麦遗存的发现说明,小麦自西向东的传播,最早很可能进入阿尔泰山区,再传播至天山地区,继而向东传播。也就是说,新疆地区一定存在早于公元前 3 000 年前的以牛羊畜养、小麦种植为主要农业生产经济的考古学文化。

(五) 小河文化的起源

一般情况下,作为结构稳定文化体的考古学文化,尤其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是在适应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的基础成长发展起来的。因此,考古文化的溯源应该到当地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

2016 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楼兰城附近一处雅丹地层内采集到一件石制品。该石制品是一件研磨器,为原地埋藏,

① 参见任式楠《中国史前农业考古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2005 年 1 期。

②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 年第 7 期。

③ 参见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通道》,《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56—459 页。

④ 参见 Chunxiang Li, Diane L. Lister, Hongjie Li, Yue Xu, Yinqiu Cui, Mim A. Bower, Martin K. Jones, Hui Zhou, et al., “Ancient DNA analysis of desiccated wheat grains excavated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in Xinjia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8, no.1 (January 2011), pp.115—119; Xiyan Wu, Baoxu Ding, Bingqi Zhang, et al, “Phylogenetic and population structural inference from genomic ancestry maintained in present-day common wheat Chinese landraces,” *the Plant Journal*, Vol. 99, 2019, no.22, pp.201—205.

⑤ 参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其特征》,《考古》2009 年第 5 期。

未经二次搬运,石器上有明显的人为磨制痕迹。据研究,石制品的年代在距今 13 000 年,处于晚新世末期。石制品裂隙残留物分析显示,当时罗布泊地区居住的人类,采集小麦族类(Tribe Triticeae)(小麦族类包括有羊草、粗山羊草、冰草、黑麦、青稞、小麦和大麦)植物和根茎类植物等作为食物性植物,并利用石制品进行简单加工。“晚更新世末期罗布泊西岸入湖三角洲地区的湿润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充足的植物资源,可能是一处人类活动较频繁的绿洲湿地。”^①这一发现提供了探索塔里木盆地东部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线索。

考古发现与分析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生态环境良好的塔里木河中下游和孔雀河流域,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一万年以后,这一地区人群活动更为频繁,留下了许多细石器遗存。这一时期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区域的人群,遗传谱系上是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的混合类型,他们是小河文化人群的祖先。小河人群和文化的主体始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小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新的文化因素,如源于西方的牛羊驯养、小麦农作物,和来自东方的黍类农作物,这些都不断丰富着小河文化的内涵,促进了小河文化的发展。

二、小河文化遗存反映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文化交流与互动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常态。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类型是小河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小河文化的成长。文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多向的,小河文化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其文化又反作用于周边区域。

(一) 小河人群“遗传隔离”及其与外界的交流互动

前述古遗传学研究显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古北亚与古东亚人群混合的人群集团,就已分布到了塔里木河中下游和孔雀河流域,一直到小河文化第一期,都未与任何其他遗传特征人群发生过基因交流。研究者进一步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于塔里木盆地独特的沙漠化气候形成的天然遗传屏障造成的,从而保留了原始的基因特征。^②

小河文化早期人群及其祖先的“遗传隔离”,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他们长期世代居住的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区域是一个“死岛”,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外界人群集团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就无法理解小河文化结构中多种因素的来源与发展,也难以理解至少在公元前 3 000—前 2 500 年,欧亚西部家养牛羊和小麦种植等技术,主要通过包括塔里木盆地东部小河文化集中分布区在内的天山山麓一线,传入河西和中国西北其他地区的事实,同样,还有源于我国华北的农作物黍,在距今 5 000 年以后,开始沿着阿

^① 李康康、秦小光、杨晓燕等:《新疆罗布泊地区晚更新世末期人类活动新证据》,《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9 年第 2 期,第 405 页。

^② 参见 Fan Zhang, Chao Ning, Scott A. et al.,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021, pp. 256–261.

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向外传播。这些牛羊畜养和农作物种植技术与文化的传播,暗示着小河人群的祖先与周边区域人群的接触与交往的持续存在。只不过,这种人群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很早就居住在包括南北疆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辽阔区域内的,古北亚和古东亚成分人群之间发生的,他们原本就属于相同的遗传谱系,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混血,并未改变当地人群的遗传特征。即便在距今 5 300 年以后,以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人群东迁、南下,与新疆当地人群成分发生不同比例的混合,但所呈现的是一种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① 距今 4 000 年前,生活在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地区的人群,与北来的草原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有限的,至少在小河文化第一期人类遗传谱系上没有表现出来。

目前,崔银秋教授和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对新疆青铜时代人群的古 DNA 研究,都还没有涉及小河文化晚期(公元前 1 700—前 1 450 年)的人类遗骸样本。2016 年,吉林大学周慧教授研究团队,曾成功获取了小河墓地早、晚期共 57 个个体的线粒体 DNA 序列。分析表明小河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表现出晚期成分较早期成分复杂的特征,晚期出现基因多态性增高的趋势,进而改变了人群原有的遗传构成。^② 我们将这一 DNA 研究结果与小河文化分期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小河文化早晚期文化特征出现的变化,可能是由人群遗传谱系的变化引起的,小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区域持续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二) 小河文化与欧亚北部草原文化的交流

距今 5 300 年前后,欧亚大陆西侧颜那亚文化为代表的草原牧业人群,从里海—黑海北岸向东迁徙,在西西伯利亚地区与当地人群交流融合,形成了以南西伯利亚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人群集团。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的分支,很快进入到阿尔泰山南麓和伊犁河谷。阿尔泰山南麓的哈巴河县阿依托汗、^③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松树沟^④与托里县那仁苏,^⑤以及西天山北麓伊犁尼勒克墩那高速公路考古发掘

① 参见 Fan Zhang, Chao Ning, Scott A., et al.,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021, pp. 256–261.

② 参见李春香、周慧《小河墓地出土人类遗骸的母系遗传多样性研究》,《西域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县阿依托汗一号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7 年第 2 期。

④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 219 国道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 年第 1–2 期。

⑤ 参见阿里甫江·尼亚孜《新疆塔城托里县那仁苏墓地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 年 4 期。

中^①都发现了他们零星的墓葬遗存。墓葬中均出土有典型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橄榄形陶罐,器表饰以密集的压印几何纹。遗存的年代在公元前3 000—前2 500年左右,属于铜石并用时代。阿凡纳谢沃人群的南迁与文化的扩散,将青铜冶铸技术带到天山地区。此后,奥库涅夫文化,特别是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不断向南扩散,奥库涅夫文化和安德诺沃文化的陶器,以器壁略直和微鼓的缸形器为主,器表装饰风格为刻画、压印或戳刺圆点纹表现的几何纹样。目前,在天山地区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属于奥库涅夫文化的遗存,只是一些陶器风格与其同类器物接近,推测应是受到奥库涅夫文化影响的结果。其后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更为频繁地进入天山地区,在天山南北留下多处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地和遗址。^② 这些遗存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 800—前1 200年间。

多年来,在塔里木盆地小河文化分布区,考古调查不断采集到压印刻画纹系统的陶器、陶片。罗布泊地区采集的陶片中,有一组属于压印刻纹陶器系统,陶器器形简单,大多为无耳的筒形器、罐形器和缸形器,器表用刻画、压印或戳点方式装饰几何符号。这些压印刻纹陶器,有时与小河文化的草编器在同一地点采集,不排除小河草编器与压印刻画纹陶器在相同的考古单位共存过。^③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附近青铜时代遗存分布区。^④ 由北部草原向南传播的压印刻画纹陶器系统与小河文化的关系,还可以从小河文化草编的形态与纹样方面得到说明。罗布泊、尼雅北部遗址、克里雅河尾间区域发现的筒形器口沿的绳纹,与小河草编口沿绞编出的绳纹带非常相似。小河文化的草编篓,有平底有圜底,或直筒或微鼓腹,无耳或双系耳,其造型及编织的弦纹、折线、三角、阶梯纹等,基本上都可以在塔里木盆地或欧亚草原一带的压印刻画陶器上,找到模仿的印迹。^⑤ 小河文化的墓葬中未出土过陶器,并不能代表小河人日常生活中不使用陶器,很可能是小河居民并不把陶器当成随葬品,也如同小河居民已经广泛使用青铜工具,但不以青铜工具随葬一样。可以推测,塔里木盆地中部以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压印刻画纹陶器,特别是筒形器,其流行的年

① 参见刘兴汉、特尔巴依尔、王晓丹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3期。

② 参见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1期,第81-97页;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2018年第1期,第125-154页。

③ 参见李文瑛:《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它》,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5页。

④ 参见林铃梅、李肖、买提卡斯木·吐米尔:《近年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采集陶器的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第36-57页。

⑤ 参见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324-326页。

代与小河文化年代有重合。综合考察,压印刻画纹陶器很大可能也是构成小河文化的因素之一。

从草编篓与阿凡纳谢沃文化中橄榄形陶罐存在的关系看,在阿凡纳谢沃文化分布区,草编器应该很早就是当地人们生活中的常用器物。^① 草篓不像陶器那样容易造型,在绿洲植被繁茂地带取材方便,且容易互相模仿,交互影响。所以,欧亚草原地带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发现的史前时期陶器,从形体到纹样都可以看出其对草编器模仿的迹象,这也可能是欧亚草原地区史前不同阶段,陶器的类型简单、装饰风格基本一致的原因所在(见图3)。构成小河文化最显著特征的草编器、木器等,也会通过天山地区对北方草原地区产生影响。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少量的直腹或微鼓腹的筒形陶罐,明显模仿了小河文化的草编篓和筒形木罐。^② 吐鲁番洋海墓地早期墓葬出土的少量筒形陶罐,也很可能是受到小河文化木筒和草篓影响出现的新器型。天山间盆地和天山以北的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罕有类似小河文化的草编器和木器等发现,可能是环境的原因,有机质材料未能保存下来。

此外,小河墓地北区木房式墓葬(BM28)中出土了1件石质圆形权杖头。世界最古老的权杖见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我国权杖头出土最早是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察权杖头在欧亚大陆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明显带有自西东传的迹象。^③ 小河墓地权杖头出自墓地唯一的大型木房式墓葬中,死者生前社会地位之高可见一斑。总体讲来,小河文化的权杖,明显是新疆史前青铜时代东西文化互动过程中,由西、北传播到了孔雀河小河文化分布区的。

(三) 彩陶与黍类农作物西传小河文化区

在罗布泊地区,与压印刻画纹陶器、草编器一起,共同采集的还有彩陶。天山地区彩陶文化的兴起与黄河上游彩陶文化的西渐有关。^④ 在罗布泊属于小河文化的09LE3号遗址中采集的彩陶片,施紫色彩,其中的“藤蔓”纹和双斜线内填平行线纹样值得注意。“藤蔓”纹样风格,接近开都河流域察吾呼文化彩陶图案中的“藤蔓”纹,双斜线内填短横线形成的通体斜带纹,与察吾呼文化局部彩图案条带纹也较为相似。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采集的彩陶中“绳组纹带”很像横置的“藤蔓”,也表现出与察吾呼文化的关系。^⑤ 这些发现表明小河文化的晚期,开始融入东来的彩陶文化。

① 参见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研究》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② 参见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藏学研究》第三辑,第1-63页。

③ 参见李水城《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④ 参见刘学堂《天山彩陶系统的形成及意义》,《中原文物》2023年1期。

⑤ 参见李文瑛《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它》,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第44-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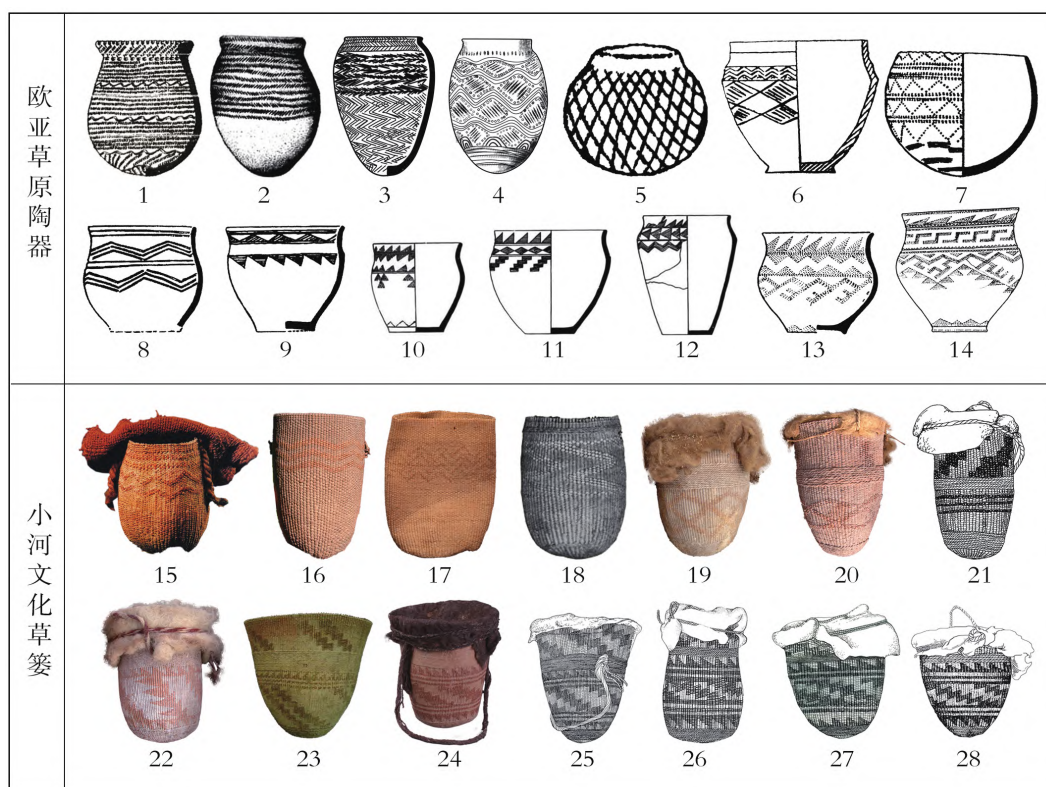


图 3 小河文化草篓与欧亚草原陶器对比图

1.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伏尔加河赫伦斯克墓地); 2、3、5.阿凡纳谢沃文化陶器(分别出自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耶兰达村附近墓葬、米奴辛斯克盆地小科比内村墓葬及帖西村墓葬); 6.新塔什塔类型陶器(哈萨克斯坦西部塔那博尔根墓地); 7.铜石并用时代陶器(乌拉尔地区伊万诺夫卡遗址); 8-14.安德罗诺沃文化陶器(8.乌拉尔地区阿拉库尔类型,9.科祖姆贝尔迪类型,10-14.哈萨克斯坦北部费德罗沃类型); 15-28.小河文化草篓(15、17.古墓沟墓地,16.楼兰 LE 一带采集,18.LF 墓地,19-22、24-28.小河墓地出土,23.克里雅北方墓地)

小河文化遗存中发现大量黍类农作物。小河文化中黍的基因分析结果显示,其遗传结构特征与中国华北来源的黍完全一致。^① 学术界公认,黍、粟类农作物,最早由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驯化、培育,很快成为黄河流域史前农人最广泛种植的农作物,构成中国北方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距今 5 000 年的碳化麦粒的同时,还发现了黍粒。^② 这里黍类遗存的发现说明,黍类农业物向西传播很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由北部草原地带西向传播;二是由黄河上游、河西走廊西向传播。后者因是传统的绿洲农业经济区,应当是黍类农作物传播的主要途径。

① 参见 Chunxiang Li, Yu Dong, Minxuan Liu, et al. “ Ancient DNA analysis of *Panicum miliaceum*(broomcorn millet)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in Xinjiang, China,” *Veget Hist Archaeobot*, 2016,25,pp.469-477.

② 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 年 7 期。

黍类农作物在天山南北地区的广泛种植,使史前新疆与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一样,成为以种植黍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经济区。

(四) 小河文化金属及费昂斯^①制品的来源

小河文化墓葬中不见随葬大型金属器,只在克里雅北方墓地及附近采集有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小河墓地墓葬中,除偶见铜镜、铜镞外,大量发现的是不明用途的碎小铜片,多散置在死者身上或钉在棺前立柱上。北京科技大学梅建军科研团队的研究报告了对 19 件小河墓地出土金属器的初步科学分析结果,其中包括 12 件金属样品和 7 件金耳环实物标本。分析结果表明,在 12 件金属样品中,7 件为铜锡合金,3 件为纯铜,1 件为铜锡砷合金,还有 1 件耳环为纯锡;而 7 件金耳环全部用金银合金制成;所使用的加工工艺主要为热锻和冷加工。值得注意的是,锡耳环和金银耳环均为迄今中国境内经科学鉴定发现的最早的锡和金银合金制品。小河墓地金属器在材质和加工工艺上所展现出的多样性,可能是其来源多样化的反映,反映了小河文化与周邻地区早期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或互动。^②

冶金技术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中,在中国境内首先出现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和西天山地区。青铜冶铸技术与文化,向南传播过程中进入东天山哈密盆地,在这里与东来的马厂—西城驿—四坝文化的彩陶文化相遇,东西文化交融催生新的文化创造力,东天山地区因而成为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700 余座墓葬中出土铜器 3 000 余件,类型丰富,年代主要在公元前 2 千纪初前后到公元前 2 千纪中叶。小河文化偶见的铜镜、铜镞等,与发生在东天山哈密盆地青铜冶铸业的兴起,应该有密切关系。

小河墓地出土了 30 件费昂斯珠饰。据研究,这些费昂斯珠饰年代偏早的样本为混合碱型费昂斯,其余样品则均为富钠植物灰型费昂斯,两类费昂斯在施釉工艺上亦有明显差别。混合碱型费昂斯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经欧亚草原传入了塔里木盆地。富钠植物灰型费昂斯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实物,其源头很可能在埃及或近东地区。由于小件珠饰便携易传播的特点,这些珠饰可以通过远距离传输进入塔里木盆地。^③

(五) 小河原始信仰遗存反映的文化交流

小河文化遗存反映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得也很突出。这可以用小河文化的人形雕像装饰、对数字“七”的崇拜为例说明。

① 费昂斯(faience),是一类内部为烧结的石英胎体,外表施釉的玻璃质材料。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中,往往将费昂斯看作是玻璃的前身或“原始玻璃”。

② 参见梅建军、凌勇、陈坤龙等:《新疆小河墓地出土部分金属器的初步分析》,《西域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③ 参见刘念:《新疆天山地区史前玻璃质珠饰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 年。

小河文化遗存发现大量人形雕像,尤其以小河墓地出土最多,以木雕为主,其次为骨雕,还有个别石雕。这些人形雕像的形态差别较大,功能上推测多与灵魂崇拜有关,^①可能是原始萨满信仰中的不同功能的神偶。^②韩建业注意到,距今4 0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在新疆地区的小河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等当中,有一种头面装饰奇特的萨满式人物形象,这类形象在大体同时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奥库涅夫文化和卡拉库尔文化等当中有着更为丰富的发现,类似形象还见于新疆康家石门子,以及阿尔泰山、天山、贺兰山、阴山等地区的岩画。韩建业推测这些亚洲北方草原广大地区的形态近似的萨满式人物形象,不但彼此时代相近、互相存在联系,而且可能具有共同的萨满特征的信仰底层。^③这一认识很有见地,从中可以透视小河文化人群与北方草原人群在精神层面的交往交流,在信仰上有过“心灵的沟通”。

小河文化人群对数字“7”的崇拜表现在许多方面,小河墓地数字“7”的遗存发现最为丰富。如男性棺前普遍竖立象征女阴的桨形立木,其“桨柄”上段涂红,在涂红的地方多刻出7道旋纹。整个墓地规格最高的墓葬是北区的大型木房式墓葬,在木门两侧整齐垒叠7层牛头。男、女性墓中常见随葬小型木雕人面像,人像多在高凸的鼻梁上横搭7根细毛线。男性墓葬随葬的蹄状木柄石器,石器呈条状,上刻7道细槽,刻槽的地方涂成红色。墓主人服饰上“7”的信息更是比比皆是,如毡帽所插羽饰的木杆上涂红并刻7道细槽;插别斗篷的木别针上,刻7组三角纹饰带并通体涂红;墓主人佩戴小白石珠和玉珠串成的手链,多绕腕7圈后拴系;女性随葬的木梳梳齿,以7根为多。此外,孔雀河古墓沟墓地第二类型的6座墓葬,地表“太阳形”标识用栽立的短木柱围成7圈(见图4)。列维·布留尔认为,“7”这个数首先是在中国人或亚述巴比伦人的信仰发生影响的地方,被带上了特别神秘的性质。^④叶舒宪曾指出,“7”的神秘力量的来源,不能用从美索不达米亚——人类最高的文化基地传播到四面八方来解释,因为在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辐射不到的地方仍然存在“7”这个圣数。^⑤从近年欧亚考古研究的成果看,对数字“7”的崇拜很可能最早出现在欧亚草

① 参见李文瑛《新疆史前美术考古》,赵丰主编《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② 参见刘学堂《试析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木雕人像与代人木牌》,《吐鲁番学研究》2003年2期。

③ 参见韩建业《略论新疆四千纪前的萨满式人物形象——兼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

④ 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3页。

⑤ 参见叶舒宪《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马倡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6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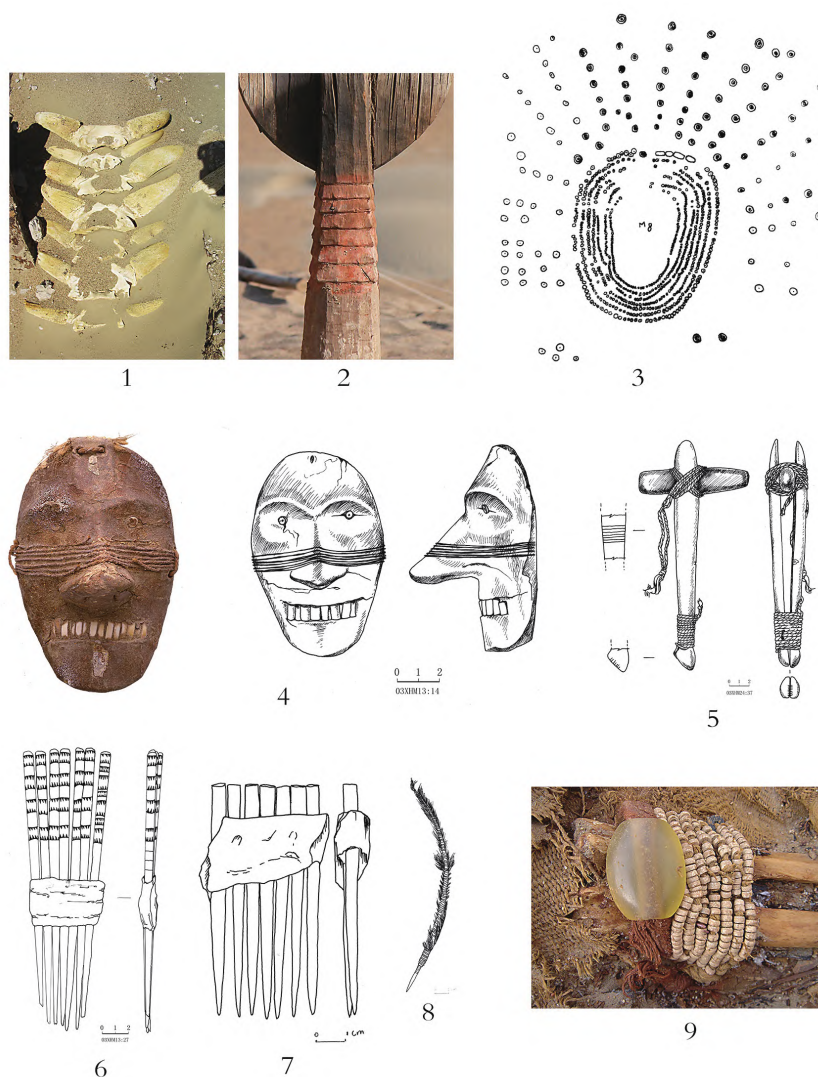


图4 小河文化中表现数字“7”的遗存

1.墓室门侧垒叠7层牛头(BM28);2.桨形立木上刻7道旋纹(M71);3.古墓沟墓葬地表“太阳”形标识;4.木雕人面像(M24、M13);5.蹄状木柄石器(M24);6、7.齿木梳(M13、M11);8.羽饰杆上刻7道细槽;9.绕7圈的白珠手链(M90)

原,青铜时代传至我国新疆及中亚广大地区,成为这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①

三、结语

小河文化是青铜时代出现在塔里木盆地中东部区域的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

^① 刘学堂《中亚古代民族文化中崇七习俗探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6期。

其文化起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在小河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小河人群不断与北方草原地区、河西走廊和中国西北的其他地区人群进行文化交流互动。小河文化分布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内部是呈环状、带状分布的一块块绿洲,这些绿洲自古以来就是联通东西南北交通的驿站,是亚洲大陆东西文化交流频繁活跃的重要区域。小河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考古学个案,生动展现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也实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斑斓多彩。

(作者李文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乌鲁木齐 830011)

(责任编辑:张子新)

political wisdo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CONG De-xi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73)

Abstract: The Bronze Age of Xinjiang begins to unfold around the 3rd millennium BC, and it gives rise to several interconnected important regions, all of which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surrounding regions respectively. These regions have different period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different origins; together they create a unique view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Xinjiang. In the Bronze Age, around eight to nine regions, including Hami basin, Turpan area, Junggar basin, Pamir plateau, and rim of the Tarim basin, all fostered their unique culture features, as well as kept exchanging and blending with each other. To probe into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features of these regions in-depth, and to explore how adjacent regions influence, intertwin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s one crucial channel for us to observ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Starting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partition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Xinjiang area, this article will, 1) comb through their respective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of their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exchange, 2) depict the patter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3) explore the basic form, motivation, and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diversity of Bronze Age in Xinjiang.

Keywords: Xinjiang;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diversity;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Origin,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of Xiaohe Culture in Tarim Basin

LI Wen-ying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93)

Abstract: Xiaohe culture is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with distinct features that emerges during the Bronze Age in middle and eastern Tarim basin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period study on Xiaohe culture, and by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new findings of ancient DNA research on human remains of Xiaohe culture, as well as findings and researches on Anthropolithic remains in Tarim basin, the main body of Xiaohe culture and Xiaohe people has a local origin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whose human genetic lineage is the hybrid of Ancient North Eurasia (ANE) and Ancient East Asia (AEA) . As Xiaohe

culture takes shape and develops, it engages in constant material and spiritu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with cultures of grassland areas to the north, Hexi Corridor, and other regions in Northwestern China. The archaeological case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Xiaohu culture not only elucidates in detail that Xinjiang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multi-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 Asia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gorgeous and splendid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united in diversity ever since prehistoric times.

Keywords: Xiaohu culture; trace source; ancient DNA; Anthropolithic ag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ethnic Garrison System of Yili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HAO Yuan-li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113)

After asserting its rule over Xinjiang, Qing dynasty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garrison cities at the heartland of Yili River Valley, including the Nine Cities of Yili, Sibe Garrison's Castles, kalun (military post) , and yingpan (military camp) .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n these ruins conclude that garrison towns in Yili area show characteristics of uniformity, hierarchy, and alliance in their structure and spatial layout. The character of uniformity is most evidently embodied in the structure of Nine Cities of Yili and kaluns, hierarchy in the difference in scale of garrison towns, and alliance in the spatial layout of garrison towns.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adopted a "dual cores" mode for the layout of Nine Cities of Yili, and built two city clusters, Huiyuan city and Huining city, which are arranged in a way that the two cities can divide forces of intruders and cover each other when defending enemi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Qing resettles tribes of Manchu, Han, Sibe, Solon, and Mongolia ethnic groups in and around garrison towns and instructs them to defend different regions with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defens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facts have clearly shown that, this system of garrison played it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ole in effectively stabilizing the situation of Xinjiang,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 Nine Cities of Yili; kalun; Sibe Garrison; Manchu town; Green Standard Army

Column V: Studies on the Practice of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